

·目录学研究·

《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未著录《文苑英华》考*

翟新明

内容摘要: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最早保存在元陶宗仪所编《说郛》中,其类书类与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被近现代学者视为讨论总集是否可以归属为类书的最重要例证之一。但通过对此例证缘起的文献梳理、对见存明抄百卷《说郛》本的考察可以发现,《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所著录者实为《戚苑英华》而非《文苑英华》。见存明抄《说郛》本不误,自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本始妄改“戚”为“文”,谭莹、缪荃孙因仍其误,张宗祥校刻《说郛》而径改明抄本,均导致学术界对此的错误认识,其背后则隐藏着混同总集与类书的学术心理。

关键词:《遂初堂书目》 《文苑英华》 《戚苑英华》 总集 类书

《四库全书总目》称类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①,实际上指出了类书与其他部类之间的错杂关系。在古代书目中,类书往往与政书、韵书、史抄、杂家、总集等其他部类的文献发生关联,尤其是对类分特点的强调,导致后者也往往被视为类书。其中,总集自其产生之始即具有类分的特点^②,自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在类事之外兼收类文,类书与总集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类书中的类文部分往往被视同总集,如胡应麟称“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③,以《艺文类聚》《初学记》近于总集。另一方面,部分总集也被视同类书,一般认为,宋初所编总集《文苑英华》即在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中被互著于类书类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明前书目之总集著录研究”(531118010249)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页。

②参见翟新明:《篇、体与文章选本:以〈《文选》序〉为中心的先唐总集编纂考察》,《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22辑,广陵书社,2019年。

③胡应麟:《九流绪论》下,《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页。

与总集类中,此点自缪荃孙始指出以来,学者均无质疑。

近代以来,自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将《文选》《文苑英华》等总集纳入类书讨论^①,也引起学术界对总集是否可归属于类书的争论。欲展开讨论,就必然要在古典文献中寻找证据依托,而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资料,即是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与总集类中互著《文苑英华》一例^②。以总集为类书者多举《遂初堂书目》为例,如夏南强举前人关于总集为类书之一类,即举《遂初堂书目》和《赵定宇书目》之例^③。反驳者也每提及此例,如张涤华认为总集非类书,提及“许敬宗《文馆词林》、李昉《文苑英华》、尤袤《遂初堂书目》均入之类书”^④;凌朝栋论《文苑英华》非类书,也引《遂初堂书目》互著《文苑英华》以为驳论^⑤。可以说,在参与讨论的学者看来,以总集视同类书,其始例即在《遂初堂书目》于类书类与总集类中互著《文苑英华》,这是讨论总集与类书关系时绕不开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自有讨论以来,学者径引此材料以为凭证,其他研究尤袤与《遂初堂书目》的论著也往往涉及此点,而从未有人考证这一例证是否存在讹误^⑥。但通过对此例证的缘起发展、明清抄刻本校勘的考察可知,《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实际上并未著录《文苑英华》,所谓类书

①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②《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著录《类文》二百十三卷、《类文》三百七十七卷,杂家又著录《类文》二百十三卷,孙猛以为系同书不同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98页)。按《玉海》卷五七“唐初学记”条引《集贤注记》注称:“初,尹凤翔宣敕与燕公云:‘儿子欲学缀文,若《御览》《类文》《博要》《珠英》之类,部帙广大。’”见(合璧本)《玉海》卷五七,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145页。(刘肃《大唐新语》则仅及《御览》,见《大唐新语》卷九,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将《类文》与《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类书并列,是将其视同类书,性质尚可存疑,且《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迟至晚清方进入国内学术视野,可暂不论。又《新唐志》类书类、总集类互著张楚金《翰苑》,然卷数不一。孙猛考证《翰苑》实为类书,《新唐志》将《翰苑》著录于总集类系编者之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151页)。《翰苑》既为类书,与本文讨论之将总集视同类书者有所不同,故仍视《遂初堂书目》为最早。

③夏南强:《类书通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夏氏即以总集为类书,见第12-14页。

④张涤华:《类书流别》(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页。

⑤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84页。

⑥鲁迅称曾据原京师图书馆藏《说郛》本与《海山仙馆丛书》本对勘,手稿今存国家图书馆,未见《〈遂初堂书目〉抄校说明》(《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蔡文晋曾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百二十卷《说郛》各本《遂初堂书目》相比较,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类书类著录作《戚苑英华》而非《文苑英华》,但并未继续深入讨论。见《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第130页。

类著录《文苑英华》，实为《戚苑英华》之讹，其背后既有妄改、因袭的版本校勘学问题，也隐藏着将总集与类书混同的学术心理因素。

一、缘起：“发现者”缪荃孙与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

尤袤《遂初堂书目》是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在《直斋书录解题》《宋志》中均有著录，其准确编纂年代已无从考证，或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至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尤袤去世之间编成^①。此目在宋元间并未刊刻，元陶宗仪所编丛书《说郛》收录全文，书名下注“一卷全抄”，知《说郛》所录即《遂初堂书目》全貌。明人所见《遂初堂书目》均源自《说郛》，如胡应麟称：“宋世藏书家至众，目率不存。尤延之《遂初堂目》今传，余阅之，亦多不备。”^②又：“尤延之《遂初堂书目》，凡经九类，史十八类，子十二类，集六类，今全载陶宗仪《说郛》。”^③又《报童子鸣》称：“今原书行世可见，仅尤氏《遂初堂目》一卷，以《说郛》钞录，始末具存。”^④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书目类亦著录《尤氏遂初堂藏书目》一卷，注称：“一册，宋尤袤，全载《说郛》内。”^⑤至于清人所见，或有称“旧抄本”者，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著录《遂初堂书目》一卷，注称“旧抄本”，由其解题可知，所谓“旧抄本”均题“尤袤延之”，且有毛开序，魏了翁、李焘、陆友仁跋，亦实即自《说郛》中抄出单行者^⑥。

对《遂初堂书目》各抄本均出自《说郛》的确定至关重要，因《说郛》及《遂初堂书目》在明清以来的抄刻而产生的文字讹误，实即来自于《说郛》不同版

①据蔡文晋考证，杨万里《益斋藏书目序》作于淳熙五年。（《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第36页）按此《序》载尤袤之言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杨万里：《益斋藏书目序》，《诚斋集》卷七八，《宋集珍本丛刊》第五十五册影印明汲古阁钞本，线装书局，2004年，第60页），则书目尚未成编而先索序于杨万里。蔡文晋复考证尤袤卒于绍熙四年（《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第23页），当为《遂初堂书目》撰作之终年。《遂初堂书目》中杂有尤袤卒后之书，则系后人补录者。

②胡应麟：《经籍会通》一，《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第14页。

③胡应麟：《经籍会通》二，《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第19页。

④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1页。

⑤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见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1页。

⑥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二，《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186页；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三七，《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一，第413页；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第59页；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第555页。

本谱系已有之误。有学者认为,如果从《说郛》各本所著录的某一文献出发,也可能查考出《说郛》详细的谱系。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提到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曾对《说郛》进行版本优劣对比,并认为:“贾敬颜的研究表明,研究《说郛》诸本的关系,不仅可以对其内容目录与作品编排做大的考察,还可以对《说郛》中的某一个(或多个)作品进行细致的研究。用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的谱系法(stemmatic methodology),考察以抄本形式复制的作品,可以确定一个抄本如何从它的一个或多个范本(exemplary)中继承特定的标志性讹误(indicative errors),然后又加入一些这样的讹误,传给从这里复制的所有抄本,如此等等。”^①艾骛德所指的谱系法实际是从校勘学视角推原版本,重在寻找到某个或多个特定的异文在不同抄本间的继承与讹变。但艾骛德对《圣武亲征录》异文考察所推原出的《说郛》谱系,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说郛》收录的其他文献。如果仅从《遂初堂书目》中异文部分最为明显的别集类四部别集之下是否存有注释出发,则属于艾骛德谱系 α 系统的汲古阁本在《唐太宗》和《真宗皇帝》下均有注释,《杨雄集》下则无(《黄陈诗注》原阙);同属于 γ 系统中的傅增湘藏本与汪季青藏本均有注释,但内容有所不同,翁斌孙藏本与世学楼本则均无。也就是说,艾骛德由《圣武亲征录》推原出的《说郛》版本谱系并不能完全适用于《遂初堂书目》,很大程度上,抄手的抄写质量也应当被考虑到。在艾骛德之外,沈畅亦尝试由所见五种明抄本对《说郛》百卷本进行谱系归纳,所得谱系与艾骛德亦有不同^②。有鉴于此,本文并不尝试详细推原《说郛》抄本谱系,而主要从缪荃孙、张宗祥对《遂初堂书目》异文的考察,以及《说郛》六十九卷本、百卷本、百二十卷本等系统出发,来对《遂初堂书目》中的特定异文进行再考。

事实上,清代以前见存文献并未有提及《遂初堂书目》将《文苑英华》著录于类书类中的记载,胡应麟曾见及《说郛》抄本,且对此本颇有异议,但未提及互著一事。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其史部目录类收录《遂初堂书目》一卷,子部杂家类复收录《说郛》一百二十卷,两书提要也均未提及。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到了《遂初堂书目》文献著录的混乱现象,其中“一书偶然复见者”有“《大历浙东联句》一入别集、一入总集之类”^③,但未提及《文苑英华》。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将《遂初堂书目》辑入《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

①(美)艾骛德撰,马晓林译:《〈说郛〉版本史——〈圣武亲征录〉版本谱系研究的初步成果》,《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九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1页。

②沈畅:《明弘治十三年钞本〈说郛〉的重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兼论原本〈说郛〉的版本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第33-42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第730页。现存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文溯阁书前提要同。

史类刊印,缪荃孙作《〈遂初堂书目〉跋》,始有提及^①。

缪荃孙《跋》是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容的扩展,尤其是对《遂初堂书目》中的复见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总计寻绎出18条,其文称:“复见之书,《提要》举《大历浙东联句》一入别集、一入总集。今考其中如……《文苑英华》一入类书、一入总集。”^②按缪氏所称“复见”实包括两种,一种为同一类下重出,一种为互著于不同部类,前者有《郊祀录》《崔颢集》《伊川先生集》,其他均是互著。缪氏首次对《遂初堂书目》中的互著现象进行了全面总结,而其中所称“《文苑英华》一入类书、一入总集”,是见存文献中最早提及《遂初堂书目》将《文苑英华》互著于类书类与总集类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未提及《文苑英华》互著于类书类与总集类,除仅举《大历浙东联句》一例以为代表外,还在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并未著录《文苑英华》,而是在相同位置即《晏公类要》后著录了《戚苑英华》,《文苑英华》仅被著录在总集类中^③。《四库全书》所收录的《遂初堂书目》系两江总督采进本,其底本今未见;《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收录有明抄本《遂初堂书目》,实影印自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并非真正的四库底本^④。但提要既未提及,文渊阁抄本亦无互著现象,则知其底本亦同。如此,缪荃孙《跋》所称《文苑英华》互著,只能被视为缪氏所见本的情况。缪氏《跋》称“此目无撰人,无卷数,毛开序,魏了翁、陆友仁二跋,与《四库》本同”^⑤,但仔细考察可知,缪氏所见与《四库全书》本实非同本。《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目称“《说郛》本”,《遂初堂书目》后又称“光绪丙申武进盛氏用旧钞本校《说郛》本开雕”,但所谓旧抄本与《说郛》本究系何种版本则并未言明。

事实上,《常州先哲遗书》本《遂初堂书目》并非《遂初堂书目》的首次单行

①见盛宣怀辑:《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光绪丙申年(1896)开雕。《跋》原为缪荃孙作,此刊本则题作“武进盛宣怀”。缪荃孙《日记》提及丙申年七月廿日撰《〈遂初堂书目〉跋》,见《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全集·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24页。此二《跋》除作者署名不同外,其他文字均同。

②缪荃孙:《〈遂初堂书目〉跋》,《艺风堂文集》卷七,《缪荃孙全集·诗文》,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07-208页。

③尤袤:《遂初堂书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473、486页。按见存四阁书中,文溯阁本未见,文津阁本与今存文澜阁本类书类则作《文苑英华》,查其别集类自《唐太宗》以下皆有“集”字(《文津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4、316页;《文澜阁四库全书》第687册,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430、432页),知此二本均源于百二十卷《说郛》本系统。文津阁本在北四阁中最后抄成,或以未见文澜阁底本而径由百二十卷《说郛》本系统抄出;文澜阁本系补抄,与文津阁本不同,具体来源待考。

④见《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第60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

⑤缪荃孙:《〈遂初堂书目〉跋》,第207页。

刊刻。道光二十六年(1846),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已将《遂初堂书目》列入第一种刊行,此本由南海谭莹校勘,同样未声明校勘所用之底本。将《常州先哲遗书》本与《海山仙馆丛书》本相比较,二本行格不同,但均列有总目,部类亦同,除个别文献缺漏、文字异文外,二本之文献著录与叙次差别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海山仙馆丛书》本仅于杂家类“隋李文博《中兴书》”条下注“重出”,而《常州先哲遗书》本增注至十八条,其他抄刻《说郛》本则无注,《常州先哲遗书》本此一体例显然是根据《海山仙馆丛书》本增广而来。因之,《常州先哲遗书》本应是参考了《海山仙馆丛书》本,而《海山仙馆丛书》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晏公类要》之后所著录的正是《文苑英华》。

进而言之,《海山仙馆丛书》本复源于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本系统^①。今存明末清初刻本《说郛》一百二十卷,如北京国家图书馆藏蔡瑛捐张寿镛原藏明末刻本(06345)^②、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刻本(501 15226)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说郛三种》影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上海辞书出版社藏本,版式均同,其卷十《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即著录为《文苑英华》,《四库全书》杂家类著录《说郛》百二十卷本同。将《海山仙馆丛书》本系于百二十卷本系统之下,是因今存各明抄百卷《说郛》本在别集类中自《唐太宗》以下均省去“集”字,而明清抄刻百二十卷《说郛》本则均增“集”字。谭莹校勘,应是直接取材百二十卷本,故其别集类中均刻“集”字,《常州先哲遗书》本亦同。亦即是说,《海山仙馆丛书》与《常州先哲遗书》本均是源自《说郛》百二十卷本系统。除明末清初刻《说郛》与《海山仙馆丛书》《常州先哲遗书》等单刻本外,今存清抄、刻《遂初堂书目》单行本尚多,如北京国家图书馆藏蒋锦和原藏本(14442)、瞿镛原藏本(06608)、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02774),南京图书馆藏丁丙原藏清抄本(110429),上海图书馆藏张桐生原藏清刻本(线普378258),浙江图书馆藏乾隆二十八年(1763)汪景龙抄本(善2144)、长兴王沅原藏清抄本(善2145)等,其类书类亦均著录作《文苑英华》^③。此类清抄、刻《遂初堂书目》实亦出自百二十卷本《说郛》,因其别集类自《唐太宗》以下均增入“集”字,为百卷本系统所无。

因此,缪荃孙《跋》中始提及《文苑英华》在类书类和总集类中的互著现象,其实根源于《说郛》百二十卷本系统。虽然互著现象自缪荃孙始最初提

①百二十卷本《说郛》编者向署陶珽,而学界多有质疑,为免争议,本文隐去编者姓名而径称重编。

②按此本《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丛部》著录为清顺治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页),《国家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则著录为明末刻本(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张寿镛《约园元明刊本编年目录》亦系之于明崇祯刻本(《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30册影印《约园杂著三编》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9页)。

③北京国家图书馆藏蒋锦和藏本类书类著录作《六苑英华》,为《文苑英华》之讹。

及,但早在明末重编百二十卷本《说郛》时已经存在,并为清代《遂初堂书目》单行抄、刻本所继承。

二、不称职的校勘:“推波助澜”者张宗祥与涵芬楼刻《说郛》

《四库全书》本与《海山仙馆丛书》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在《晏公类要》之后一著录为《戚苑英华》,一著录为《文苑英华》,二者必有一误,尚需寻找更多的文献版本依据。前述《遂初堂书目》各本均自《说郛》本出,而《说郛》本身的源流系统又颇为复杂。学界一般认为《说郛》可分为百卷本与明末重编百二十卷本两种系统^①,百二十卷本刻本及其著录情况已如前述,百卷本现尚存有多种明抄本^②。民国时,张宗祥以百卷本系统的六种明抄本《说郛》汇校而成新的百卷本,交涵芬楼于1927年刊刻行世;后又据所见汪季青(即汪文柏)藏明抄本二十五册作校勘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所编《说郛三种》中。《遂初堂书目》在张宗祥编《说郛》百卷本中居第二十八卷,此本在类书类和总集类中同时著录了《文苑英华》。

张宗祥校刻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可称当时所见明抄本之集大成,但此本未出校记,后来据汪季青藏明抄本所作校勘记对类书类此条亦未出校记,使人以为其所据的各明抄百卷《说郛》本《遂初堂书目》与百二十卷本相同,均在类书类著录了《文苑英华》而无异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张宗祥所参考与校勘的七种明抄本中的六种现在仍可寻得,张氏在涵芬楼本《说郛》跋语中介绍了所据的六种明抄本版本信息:

此书凡集明抄本六种,始成完璧。一为京师图书馆残卷……一为江安傅沅叔先生藏本,沅叔先生之书系汇明抄本三种而成……一为涵芬楼藏本……闻孙仲容先生所藏亦有残卷,去夏曾访之,不得要领,以为此生难遇矣。本年秋,奉命督浙学。临行,沅叔先生饯之于娱乐室,案头有书估携来之明抄《说郛》,检阅一过,缺卷皆在。匆匆南下,不及借抄。沅叔先生至浙观潮,竟携至南方见假,得成全书。^③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昌彼得:《说郛考》,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②对《说郛》百卷本的考察,除艾骞德外,以沈畅《再论临海市博物馆藏旧钞分类本〈说郛〉之性质》(《历史文献研究》总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明弘治十三年钞本〈说郛〉的重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兼论原本〈说郛〉的版本源流》二文最为系统;施贤明《国家图书馆藏〈说郛〉钞本考述——兼谈〈说郛〉的纂辑与流传》(《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12年)亦曾对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七种明抄本《说郛》有所考述。本文仅涉及收录有《遂初堂书目》者,凡沈、施二氏已介绍过的明抄本之行格、印鉴、递藏等信息,下文不再赘述。

③见张宗祥:《〈说郛〉跋》,《说郛》,中国书店据涵芬楼1927年版影印,1986年。

最后一种,或以为即孙仲容玉海楼藏本^①。张宗祥在《铁如意馆手钞书目》中对此本复有补充称:“傅先生曰:‘子所缺各卷均在,然索价高,恐寒士不能买,陶兰泉欲得之,我当继子南行观潮,代为借钞也。’”^②其《冷僧自编年谱》1926年条亦称:“明日,沉叔先生来告曰:‘书已为他友购去。然子无虑,予将至浙观潮,当携所缺书卷至浙,供子抄写。’”^③知实为傅增湘借抄书估所售明抄本,张宗祥并未得见玉海楼藏本。是则张宗祥所据,实为四种明抄本,即京师图书馆藏残本、傅增湘藏合配本、涵芬楼藏本与傅增湘借抄之明抄本^④。

此四种明抄本,均属于百卷本系统。傅增湘借抄之原本后来卒归陶兰泉(即藏书家陶湘)所得,王国维曾借观校对《圣武亲征录》^⑤,今未知归于何处^⑥。傅增湘藏本今存上海图书馆(线善786660-719),实系丛书堂写本、弘农杨氏写本、弘治十八年写本与明写本四种明抄本补配^⑦,傅氏复称“后友人张君宗祥据此本校定,又以他本补入少许,交涵芬楼排印行世”^⑧。其他两本则见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一为京师图书馆原藏残卷(A00487),一为涵芬楼原藏明抄本(07557)。此三本之卷二十八均为《遂初堂书目》,其类书类在《晏公类要》之后均著录为《戚苑英华》。张宗祥后来据以校勘的汪季青藏明抄本,今存浙江图书馆(善218),为蓝格抄本,四周双边,单鱼尾,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鱼尾

①如徐三见、饶宗颐均持此见,见徐三见:《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考述》,《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第112页;饶宗颐:《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目录》,《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86页。

②张宗祥:《铁如意馆手钞书目》,《铁如意馆随笔 铁如意馆手钞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4页。

③张宗祥:《冷僧自编年谱》,《铁如意馆诗钞 附冷僧自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④施贤明亦认为第六种并非玉海楼藏本,但未能深入考察此本的后续流传,见《张宗祥〈说郛〉跋再探讨》,《图书情报工作网刊》2012年第1期,第60-61页。

⑤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称“沉叔并言,尚有万历抄《说郛》本在武进陶氏。丙寅正月赴天津,复从陶氏假之”,见《圣武亲征录校注》,《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0页。

⑥陶湘所编书目均未著录此抄本,其所藏五百九十一一种丛书于1929年售予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但其内仅有“宛委山房藏版”《说郛》,此明抄本未曾出售,下落仍待考察。见《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寄赠书册目》,载高田时雄编:《陶湘丛书购入关连资料》,《东方学资料丛刊》第17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东亚人情报学研究中心,2010年,第115页。

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777页。

⑧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下,中华书局,2009年,第752页。

下写卷次,版心下标叶次,铃有“古香楼”朱文圆印、“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朱文方印。其卷二十八为《遂初堂书目》,其类书类亦著录为《戚苑英华》。

亦即是说,在张宗祥所参考和据以校勘的五种明抄本中,有四种抄本中的《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著录作《戚苑英华》,但张宗祥重编百卷本乃作《文苑英华》。那么,是否存在张宗祥原本抄作《戚苑英华》而涵芬楼刻本误改作《文苑英华》的情况呢?张宗祥据各明抄本所编定的《说郛》百卷原抄本今存浙江图书馆(善5815),黑格,四周单边,单鱼尾,鱼尾下写卷次;版心下写叶次与“铁如意馆”,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铃有“铁如意馆”白文方印、“张宗祥印”白文方印、“冷僧钞本”朱文方印、“味沧手校”朱文方印等,有朱、墨笔校改,为张宗祥手迹。此本校改后之文字与涵芬楼刻本相同,知涵芬楼刻本即据此校改本刊刻。其卷二十八《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晏公类要》之后抄作《文苑英华》,无校改痕迹。也就是说,张宗祥原抄本即作《文苑英华》,并非涵芬楼刻本之误改。

张宗祥据五种明抄本校勘《说郛》,其中四种明抄本中《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晏公类要》之后均著录作《戚苑英华》,而张宗祥原抄本乃改作《文苑英华》。究其原因,或是据傅增湘借抄的明抄本为底本,而这个明抄本恰好抄作《文苑英华》;或是张氏以意径改。在张氏原所据的四种明抄本中,傅增湘借抄本为张氏最后得见,仅供补录残卷,不能据以为底本。事实上,从张宗祥原抄本已可推断出其所据底本。查其所抄《遂初堂书目》,如类书类《唐史属辞》作《唐史属郡》、《兔园册府》作《兔园开府》、《语丽》作《语飞》,总集类《晁氏续离骚》作《晁氏续杂骚》、《典丽赋》作《典鹿赋》,文史类《诗史总目正异》作《诗火总目正异》等,均与原京师图书馆藏《说郛》本相同,而为其他抄本所无,知张宗祥抄录《遂初堂书目》即据京师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但后者在别集类《汉杨雄集》《唐太宗》《真宗皇帝》《黄陈诗注》等下并无注释,而张宗祥原抄本则有(为朱笔圈去,故涵芬楼刻本亦无)。今查张氏所见各本,惟傅增湘藏本有之,且注释内容相同,则是后来又据傅增湘藏本加以校勘。而此二种明抄本在类书类均著录作《戚苑英华》。所以,归根结底,只能是张氏以意改写,而且是在据京师图书馆藏本为底本抄录时即已径改。

更进一步,张宗祥在后续校勘之时,又为何未据傅增湘和汪季青藏本对此条加以校勘?张氏据汪季青藏抄本校勘时遗漏颇多,但其过录底本与据傅增湘藏本校勘时,乃径抄作《文苑英华》与未加校改,只能被视为是张氏坚持以作《文苑英华》为是,而罔顾底本、参校本之异文。另一方面,张宗祥之径改或是受百二十卷《说郛》本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在于此目别集类自《唐太宗》以下均以朱笔增“集”字,与百二十卷《说郛》刻本、《海山仙馆丛书》本、《常州先哲遗书》本等同,而明抄百卷本《说郛》均略去“集”字,此一巧合不能不使人生

疑。但即使张宗祥是参考了百二十卷本系统而在所抄校《遂初堂书目》中径改为《文苑英华》，也无法否认张氏妄改而不加校勘的行为。而张氏整理的百卷本《说郛》虽被广泛使用，但其全书未出校勘记，存在各种问题，也招致“用力未深”“校订未精”^①的批评。

《海山仙馆丛书》本与张宗祥校刻百卷《说郛》本《遂初堂书目》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相比较而言，《海山仙馆丛书》本影响更为深远。前述《常州先哲遗书》本系采自此本，民国间《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本排印，后如《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亦均影印此本。另一方面，自张宗祥校、涵芬楼刻印的百卷本《说郛》出，即成为学术界研究《说郛》与其收录文献最重要的版本，如中国书店1986年版《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说郛三种》均据以影印，《无锡文库》第二辑亦据以影印其中的《遂初堂书目》。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印的《锡山尤氏丛刊甲集》所收《遂初堂书目》则以《说郛》本为底本，并用《海山仙馆丛书》与《常州先哲遗书》本点校排印，实际亦来自百二十卷本，《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即影印此本。

也就是说，自《海山仙馆丛书》本与张宗祥校刻《说郛》本刊刻以来，并为学界常用的通行本，而此二本的《遂初堂书目》均在类书类与总集类互著了《文苑英华》。可以说，从“进入学术视野”而言，百二十卷《说郛》本开启了《遂初堂书目》类书类著录《文苑英华》的“事实”，缪荃孙《〈遂初堂书目〉跋》在理论上确立了这一“事实”，而张宗祥重编《说郛》本与后世据此本与《海山仙馆丛书》本的各种影印、排印本则进一步推广了这一“事实”。经由明末《说郛》重编者、谭莹、缪荃孙、张宗祥等几代人的接续“努力”，《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与总集类中互著《文苑英华》也就成为了学术界所接受与认可的事实，乃至习以为常之“共识”。而自缪荃孙首次提及以来，加以对张宗祥校刻明抄百卷《说郛》本的信任，即使见到了《四库全书》本的异文，但也并未有学者对此“共识”提出任何形式的质疑。

三、版本与校勘：以明清百卷《说郛》抄本为中心

前文梳理了《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这一“共识”的发现、确定与推广，并指出这一异文始自明末重修百二十卷《说郛》本，张宗祥据百卷明抄本校刻而径改，并不能反映明抄本本来面貌。除张宗祥所据以校勘的五种明抄本《说郛》外，见存百卷本系统的明抄本《说郛》尚多。北京国家图书馆共藏有七种明抄本《说郛》，除前述原京师图书馆藏残本、涵芬楼藏本外，翁斌孙原藏本（03907）、世学楼抄本（02408）亦收录了《遂初堂书目》，此二

^①饶宗颐：《〈说郛〉新考——明嘉靖吴江沈瀚钞本〈说郛〉记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六，第802页；《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目录》，第586页。

本卷二十八均为《遂初堂书目》，其类书类亦著录为《戚苑英华》。属于《说郛》明抄百卷本系统的还有孙仲容玉海楼藏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原“中央”图书馆藏本。孙氏藏本原藏瑞安玉海楼，后移交瑞安市博物馆（编号00032），仅残存五十四卷，《遂初堂书目》在第二十八卷^①。瑞安市博物馆暂未开放古籍阅览，故暂时无缘得见此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百卷本《说郛》（501 15223）则为抗战时期上海“中央”图书馆所收，其卷二十八为《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所著录者亦为《戚苑英华》。

此外，毛扆汲古阁旧藏有明抄本《说郛》二函二十册六十卷，现存台州临海市博物馆（以下简称“临海本”），张宗祥在涵芬楼刊刻《说郛》后曾得王舟瑶跋，但实未见此本^②。王舟瑶称此本“当是南村旧本”；但张宗祥认为“意必明人偶得不全之本，重为编排，王氏跋谓为南村原本之说，未可信也”^③，否定了王舟瑶的观点；徐三见复针对张说而考证称六十卷本较之常见的百卷本更接近陶宗仪稿本原貌^④。在临海本中，《遂初堂书目》在第五十九、六十卷，作《遂初堂藏书目》（目录分别题为《遂初书目》《遂初堂藏书别目录》）。其中，第六十卷著录别集类部分文献和小说类、杂艺类、谱录类、类书类等文献，正为第五十九卷所缺者，是一书分为二卷。但其类书类后半部分与医书类文献有阙佚，未见及所著录为《文苑英华》或《戚苑英华》，仅知其总集类著录了《文苑英华》。

值得注意的是，沈畅《再论临海市博物馆藏旧钞分类本〈说郛〉之性质》一文认为徐三见以临海本为接近陶宗仪稿本之说不可信从，并据此本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说林》的同源关系论证此本为后编本，而非陶宗仪稿本原貌。按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说林》十八册（2643），无栏，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馀字不等，钤有“岭南温氏珍藏”朱文方印、“涑绿楼”朱文方印、“温澍梁印”白文方印、“曾钊之印”朱文方印等，知经曾钊、温澍梁等递藏。其三十卷之目次与今存明抄本《说郛》前三十卷多同，知不过是从《说郛》中抄出，另标《说林》名目而已。除卷次不同外，《说林》与临海本《说郛》在钞录文字上完全相同，《说林》复多有朱笔圈点与墨笔校改，临海本则并未据此校改，中山大学图

①《浙江省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丛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2-16页。《瑞安市博物馆（玉海楼）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7页。

②张宗祥：《铁如意馆手钞书目》，第294-299页。

③张宗祥：《铁如意馆手钞书目》，第299页。

④参见徐三见：《汲古阁藏明抄六十卷本〈说郛〉考述》，后收入应再泉等编《陶宗仪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复据饶宗颐之文再证临海本为真。又见徐三见：《明钞六十卷本〈说郛〉的独特价值》，《说郛》，《台州文献丛书》影印临海市博物馆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10页。

书馆定《说林》为“清抄本,清曾钊批点”^①,知此类批校为曾钊所加。沈畅从二本条首人名删除现象定《说林》更接近于同源祖本^②,事实上,无论临海本是否为明抄本,其与《说林》同源出自明抄百卷本系统则是可以确定的^③。

《说林》第十七册末卷二八为《遂初堂书目》,第十八册末卷三十为《遂初补遗书目别集》(目录所题),查其内容,与临海本第五十九、六十卷所分《遂初堂书目》各类相吻合,且临海本所缺的类书类、医书类在《说林》本中全存。此本类书类在《晏公类要》(抄作《晏公要》)后著录为《戚苑英华》,则出自同源的临海本类书类也应著录为《戚苑英华》。值得注意的是,《说林》本将《戚苑英华》之“戚”字以朱笔圈出,旁以墨笔添“文”字,当系曾钊所改^④。

以上所考察的明抄本《说郛》均为百卷本系统,虽然各抄本之间差别较大,但其《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均著录《戚苑英华》,可知抄者在此问题上并无差别。在百卷本外,《说郛》尚存有六十九卷明抄本,即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明嘉靖沈瀚抄本五函二十四册(善837/77-11),傅增湘曾见及^⑤。饶宗颐认为此本“最接近于原书面貌”^⑥,黄复山、艾骞德亦有涉及,虽未亲见其书,但均对饶宗颐之说表示质疑^⑦。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借树山房本(A01507)与此本同源,但前者残缺不全,卷帙拼合亦有不同。此本多未注卷次,仅注有卷四十、卷四一,亦与百卷本系统不同,但各册颇能以类相从,如第三、四、十、十七、二十、二一册所录均为“录”类(即书名以“录”结尾者,下同),第十一册录“谱”类,第十二、十五册录“志”类,第十三、十八册录“记”类,第十六册录“谈”类,第十九册录“话”类等,次序更为井然,虽然后来拼合各函,导

①据《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中华书局,2009年,第26页。

②沈畅:《再论临海市博物馆藏旧钞分类本〈说郛〉之性质》,第230-231页。按杨维桢原序作“纂成一百卷”,《说林》改题为“三十卷”,而临海本改题为“六十卷”,益发可证二本均对原本有所伪改,临海本不出自陶宗仪原稿本确矣。

③临海本与《说林》本均将《遂初堂书目》分置二卷,恐系其所见原本即已如此,今存各明抄本未见有此种情形。

④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说林》,惠承中山大学中文系夏鹏飞博士、刘玲博士代为查阅并告知相关信息,特此致谢。

⑤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下,第752页。

⑥饶宗颐:《〈说郛〉新考:明嘉靖吴江沈瀚钞本〈说郛〉记略》,第804页。

⑦黄复山:《陶宗仪〈说郛〉百卷本流衍考及其缜纬辑佚之文献价值评议》,《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第801-802页; (美)艾骞德撰、马晓林译:《〈说郛〉版本史——〈圣武亲征录〉版本谱系研究的初步成果》,第417-419页。

致各函内次序混乱,但就次第而言,与临海本之后来拼凑者亦有不同^①。根据香港大学图书馆对此本的分函分册,《遂初堂书目》在其第二函第九册末卷,此本类书类中亦著录作《戚苑英华》。

除上述各《说郛》本外,北京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册明抄本《遂初堂书目》(15657),即《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收录之本,虽非四库底本,但仍有相当价值。此本为蓝格抄本,白口,四周双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四五字不等。卷首有“忽不贫斋藏本”“海源阁藏书”“大明贵池榴氏藏书”“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榴城鉴藏”等印,卷末有“长乐郑氏藏书之印”,知先后递经刘城、山东聊城海源阁、郑振铎等名家名阁收藏。此本卷首录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文,当系后人补抄。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湖东精舍明抄本《遂初堂书目》(线善 849402),首叶钤有“娄东王氏记”白文长印、“耕烟樵人”朱文方印,知为清初王翬藏书。查其文献著录,与傅增湘所藏弘农杨氏抄本相差无几,而弘农杨氏抄本中自谱录类《歙砚谱》至类书类《事物纪原》均阙,此本独存,知二本系出同源,且后者抄存全帙,文献价值颇大。此两种明抄单行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均著录作《戚苑英华》。

以上所述均是明代抄本系统,此系统中六十九卷、百卷《说郛》本与单行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均著录《戚苑英华》而非《文苑英华》,说明明代抄本系统中本未致误。前文已述及谭莹、缪荃孙之误其实始自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本,实际上,除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清抄《说林》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类著录的《遂初堂书目》源出百卷本外,清人所见《说郛》及《遂初堂书目》基本出自百二十卷本系统。此或以既有卷帙更多的百二十卷刻本,则百卷抄本自然无需注意,《四库全书》在杂家类所著录的《说郛》亦为百二十卷本,解题中也未提及有百卷本系统存世。

综上则可判定,在百卷本《说郛》系统中,《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著录《戚苑英华》,而在百二十卷本《说郛》系统中则为《文苑英华》。以上诸本,复可列表如下:

表1 《说郛》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著录一览

《说郛》版本		类书类著录	备注
六十九卷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明嘉靖沈瀚抄本	戚苑英华	或疑接近陶宗仪稿本
百卷	抄本 上海图书馆藏傅增湘原藏四种明抄合配本	戚苑英华	张宗祥所据校本

①如对港大本和借树山房本进行重新整理,当可部分恢复此本之卷次原貌,并考察其性质及与百卷本之区别,此尚有待于后续研究。

(续表)

《说郛》版本			类书类著录	备注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京师图书馆原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张宗祥所据底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涵芬楼原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张宗祥所据本
		浙江图书馆藏汪季青原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张宗祥所据校勘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翁斌孙原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或疑见存最早抄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钮氏世学楼抄本	戚苑英华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临海市博物馆藏汲古阁原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据《说林》推测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说林》	戚苑英华	源出百卷本
		浙江图书馆藏张宗祥抄校本	文苑英华	据五种明抄本校
		刻本 张宗祥涵芬楼刻本	文苑英华	据五种明抄本校刻
百二十卷	刻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刻本	文苑英华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刻本	文苑英华	
	抄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苑英华	

表2 单行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著录一览

《遂初堂书目》单行本		类书类著录	备注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		戚苑英华	据百卷《说郛》本
上海图书馆藏湖东精舍明抄本		戚苑英华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戚苑英华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蒋锦和原藏清抄本		文苑英华	据百二十卷《说郛》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瞿镛原藏清抄本		文苑英华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刘喜海抄本		文苑英华	
浙江图书馆藏清汪景龙抄本		文苑英华	
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		文苑英华	
南京图书馆藏丁丙原藏清抄本		文苑英华	
上海图书馆藏张桐生原藏清刻本		文苑英华	
《海山仙馆丛书》本		文苑英华	
《常州先哲遗书》本		文苑英华	据《海山仙馆丛书》本
《锡山尤氏丛刊甲集》本		文苑英华	据《说郛》与上述二本

四、校勘之外：总集与类书混同的学术心理预设

从版本学上来讲，饶宗颐认为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沈翰抄《说郛》六十九卷本或许最为接近陶宗仪稿本，沈畅则以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即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翁斌孙原藏本为现存最早抄本^①，此二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均著录为《戚苑英华》，后出各种明抄《说郛》本亦同。百卷本早于百二十卷本系统，各明抄百卷本系统《遂初堂书目》类书类均著录《戚苑英华》，知《遂初堂书目》之明抄本即如此，而为百二十卷本系统讹为《文苑英华》^②。

《文苑英华》是宋初编纂的文章总集，《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題》《宋志》等宋元书目均著录于总集类；《戚苑英华》则是一部类书，为唐袁说重修刘扬名类书《戚苑纂要》而成，在《崇文总目》《新唐志》《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題》《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志》等宋元书目中均著录于类书类。从校勘学上来讲，“文”误为“戚”较难，而“戚”误为“文”则易，不过，“戚”“文”二字在字形、字音上并不相近，非形近、音近致讹。考其致误之由，当是明末编、抄、刻者仅熟悉《文苑英华》而不知有《戚苑英华》，又因类书类前已著录有《文馆词林》一书，《文苑英华》与之性质相近，故误改《戚苑英华》为《文苑英华》，甚或径以为此处原本即应著录《文苑英华》而妄改。前述清人曾钊在《说林》中将《戚苑英华》圈改为《文苑英华》，如非据

①沈畅：《明弘治十三年钞本〈说郛〉的重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兼论原本〈说郛〉的版本源流》，第42页。

②当然，也存在陶宗仪《说郛》或尤袤《遂初堂书目》原本在类书类著录了《文苑英华》，而在现存明抄本中被改为《戚苑英华》的可能性。明人有妄改书的风气，顾炎武即称“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陈垣：《日知录校注》卷十八，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0页），则以情理推之，今存各抄本经明人妄改，似也不无可能。但《说郛》百卷本之来源不一，贾敬颜、艾骞德、沈畅所推原的百卷本内部系统已自繁杂，而各系统的抄本均源自一个经明人妄改的抄本，抑或不同系统的抄本经不同抄者校改，从而不约而同得达成所有明抄本均将《文苑英华》改为《戚苑英华》的结果，似并不可能。另一方面，《戚苑英华》在宋代已佚，《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志》之后未见各目著录，且《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著录及解題即完全取自《郡斋读书志》，《宋志》则取材宋国史艺文志，是元人未见此书，明人亦无从得见此书，其对《戚苑英华》的认识只能来自于宋元书目。则明人由《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著录《文苑英华》而引起质疑，乃至径改为并不熟悉的《戚苑英华》，亦非常理所能解释。此外，若径改《文苑英华》为《戚苑英华》，何以未将同在类书类的《文馆词林》一并修改以免争议？其三，今存各明抄本均作《戚苑英华》，而只有明末刻百二十卷《说郛》本作《文苑英华》，若明末重编时所据是更接近陶宗仪原本的抄本，何以其他明抄本未能根据此一版本而乃一致著录作《戚苑英华》？凡此种种，均可佐证尤袤《遂初堂书目》原本即在类书类著录《戚苑英华》，作《文苑英华》者确系经后人妄改。

所见百二十卷《说郛》本,则或即与明末人之妄改相同,即知有《文苑英华》而不知《戚苑英华》,又以作《文苑英华》者为是。

要言之,通过对见存各明抄《说郛》本及单行本《遂初堂书目》的考证,可以证明其类书类中所著录者实为《戚苑英华》,自百二十卷《说郛》本讹“戚”为“文”,后人复以常见《海山仙馆丛书》和张宗祥涵芬楼校刻本,遂以为《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与总集类中互著《文苑英华》,习焉不察,据信不疑,辗转皆误。

如果将视野跳出传统的版本校勘学,而去思考自明末重编《说郛》者、谭莹、缪荃孙、张宗祥以下至近现代学者,何以对《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中著录《文苑英华》坚信不疑,也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谭莹据百二十卷《说郛》本校勘,应是未见百卷明抄本;缪荃孙称《遂初堂书目》之存在复见,未加褒贬,是因其所见本如此,亦未考察甚或未曾见及百卷本系统^①,故仅述其所见“事实”;至于明末人据百卷本重编百二十卷《说郛》,张宗祥备阅五种明抄百卷本,必然见其异文情况,而在抄录底本时即选择《文苑英华》而非《戚苑英华》作为定本,在后续校勘中又不加订正,背后的学术心理也值得思考。

从目前见存的文献来看,最早将《文苑英华》著录于类书类的是明代赵用贤所撰《赵定宇书目》,其类书类在《太平御览》后即著录《文苑英华》八套^②,这应是受到明代对类书概念重新界定的影响。胡应麟《诗薮》称“太宗……又诏李昉等辑三大类书”^③,此是以三大书中《太平御览》被视同类书,故以《文苑英华》亦为类书。祁承燾称“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④,也注意到了类书与总集的交杂。但这还仅是类书内部的细分,至于林世勤编《注〈骈语雕龙〉书目》,则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下各分四部类书,其集部类书著录《文苑英华》以下三十部,既包括分体与多体文章总集,也包括《文章志》类以及诗话著作^⑤。《赵定宇书目》将《文苑英华》著录于类书,也正是在明代中后期对于类书与总集关系重新思考学术背景下的

①缪荃孙于清宣统间编有《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内著录《说郛》,未注明版本来源,应即原京师图书馆藏明抄本,但此远晚于其作《〈遂初堂书目〉跋》时。

②赵用贤:《赵定宇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③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7页。

④祁承燾:《藏书训略》,见郑澐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第24页。

⑤见游日章著、林世勤注:《骈语雕龙》,《丛书集成初编》据《宝颜堂秘笈》本排印,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14页。

一种尝试^①。

事实上,《文苑英华》与宋前总集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宋代以前编纂的诗文总集,自《文章流别集》《文选》以下,均系以文体类分,各体之下再分小类。如《文选》著录文体三十九类^②,为第一级分类;赋、诗二体之下再分为十五、二十三小类,为第二级分类。其二级分类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胡大雷称诗体之下的分类可分为“诗作的外在目的”“诗作的内容”“作诗的体式”三种不同标准,而赋体之下则仅依照创作的内在目的而分^③。唐代编纂的《艺文类聚》兼收事文,其类文部分也是以文体类分,但各文体之下不再分类,而是将文体统摄于某一部类之下,如天部之下分天、日、月、星、云、风、雪、雨、霁、雷、电、雾、虹等类,天类之下分诗、赋、赞、表四体,日类下分诗、歌、赞三体等。也就是说,总集是文体下分部类,而类书类文部分则是部类下分文体,二者之间正好形成了对立。

但总集文体之下的部类并不等同于类书的部类,其二级分类标准仍更侧重于文体内部的划分。首次打破这一标准的是唐代许敬宗等编修的《文馆词林》。据日本弘仁本残卷可知,《文馆词林》首列文体一级分类,次列部类等二三级分类,如卷一五二、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一六〇均为诗体(一级分类),其下复分人部、礼部(二级分类),人部下有赠答(三级分类),赠答下有亲属赠答、杂赠答(四级分类),亲属赠答下有夫妇赠答(五级分类)。除人部、礼部之外,其他文体下的二级分类名称,如武部、百官,也属于类书性质^④。即是说,《文馆词林》对于文体下的分类采取了类书分类的标准。这应与许敬宗曾主持参与《东殿新书》《文思博要》《累壁》《瑶山玉彩》等类书的编纂有关,遂将类书部类纳入到了总集的分类之中。

《文苑英华》的编纂亦同于《文馆词林》,首分赋、诗至祭文等三十八类文体,赋下复分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禋祀、行幸、讽喻、儒学、军旅、治道、耕籍、乐、钟鼓、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射、博弈、工艺、器用、服章、图画、宝、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等类。表面上看来,是以赋写内容为分类依据,但如天象、岁

①值得注意的是,赵用贤(1535-1596)、胡应麟(1551-1602)、祁承燾(1563-1628)、林世勤四人均活动在嘉靖、隆庆、万历间。林世勤生卒年不详,据《明史·林瀚传》,林世勤父林懋卒于万历七年(1579),而《骈语雕龙》前有万历戊申(1608)张献翼序,此书亦当作于隆庆、万历间。

②据傅刚考证增入“移”“难”二类,见《〈文选〉三十九类说考辨》,《〈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胡大雷:《〈文选〉编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199页。

④有关《文馆词林》,参见罗国威:《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

时、地、水之类都是类书中出现的部类名称。《文苑英华》的编辑者李昉等人也同时参与了类书《太平御览》的编纂,类书的分类方式也同样进入了总集。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文馆词林》《文苑英华》可以被视为以类书分类方式编排的总集,对于了解类书观念者,自然会产生将此二书视同类书的联系。而百二十卷本系统《说郛》中收录的《遂初堂书目》恰恰在类书类中著录了《文馆词林》与《文苑英华》两书,加以长期以来将宋初“诏修三大书”(周必大《〈文苑英华〉序》)讹为“三大类书”(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的误解,故如张宗祥虽见及明抄本异文,而仍径抄作《文苑英华》,所考虑的恐怕就是以为尤袤将《文苑英华》《文馆词林》视同类书,甚至其内心深处已先有《文苑英华》即是类书的学术心理预设。至如明末人重编时之妄改、清代曾钊之圈改,其背后也正隐藏着类似的学术心理。更进而言之,《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中著录了《文馆词林》的事实,《文苑英华》与《文馆词林》相类似的类书部类编纂方式,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将《戚苑英华》径改为《文苑英华》的“合理性”。

事实上,《遂初堂书目》类书类确实著录了另一部总集《文馆词林》。然《文馆词林》在宋初已佚^①,《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均未著录。《宋志》总集类著录《文馆词林诗》一卷,查其次第,应是源自《三朝国史艺文志》著录^②;《崇文总目》总集类仅著录《文馆词林弹事》四卷,为弹事体之单行本,且南宋绍兴改定时已注“阙”字,是至南宋初年亦佚^③。此佚籍反见于南宋之《遂初堂书目》,实在值得怀疑,但各明抄本《遂初堂书目》类书类确实都著录了《文馆词林》,此无疑义。考《中兴馆阁续录》卷三“储藏”著录有“名贤墨迹八十九轴”,其中有“元和名贤书《文馆词林》一”^④。尤袤曾在秘书省任职,周必大于淳熙三年(1176)所作《乞取唐仲友尤袤书目札子》称“臣昨任秘书少监日,尝属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将四库典籍,仿

①参见罗国威:《日本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前言》,第3页。

②《三朝国史艺文志》总集类著录117部,《文馆词林诗》在《宋志》总集类位居第61部,由《宋志》文献著录源于四部国史艺文志而未作大的改动,可推原此书应为《三朝国史艺文志》所著录者。相关推原原则可参见翟新明:《宋国史艺文志及其集部著录新变考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③参见翟新明:《〈崇文总目〉总集类校考》,《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辑下卷,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70页。

④《中兴馆阁续录》卷三,第四叶下,宋嘉定三年刊、宝庆至咸淳间增补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崇文》旧目而为一书”^①，则尤袤当见及秘书省所藏此轴《文馆词林》，其《遂初堂书目》所著录之《文馆词林》，当即系此^②。但以仅存一轴，则内容恐极少，极有可能是选取某卷之中某部某类，则其视同类书，亦在情理之中。

《文苑英华》则不同，自其编成就一直存在而未有亡阙，《玉海》卷五四载：“景德四年八月丁巳，命直馆校理校勘《文苑英华》及《文选》……孝宗以秘阁本多舛错，命周必大校讎以进。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以一百十册藏秘阁。”^③《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亦均著录。尤袤在秘书省内必亲见此本，自然知晓其总集性质，当不至于与《文馆词林》之残篇等同。后人不谨于校勘，又不查其编纂与著录实情，故致误而不知。

至于近现代学者每引此材料以为例证，论证尤袤以《文苑英华》同时具有类书与总集性质，实是厚诬古人。除了他们每引《海山仙馆丛书》与张宗祥校刻《说郛》本《遂初堂书目》以致讹误外，其实正反映出学者是在论证其已预设的将总集视同类书的学术心理，而底本不善、校勘不精的两种《遂初堂书目》的通行版本也恰好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文献依据。

要而言之，在明末重编百二十卷本《说郛》系统中，其《遂初堂书目》类书类中著录的《文苑英华》已讹为《文苑英华》，此是编刻者之误，而非尤袤之误。由缪荃孙《〈遂初堂书目〉跋》之宣扬，经张宗祥校刻《说郛》百卷本之推广，后世学者多仅见及讹误之本，遂以为尤袤《遂初堂书目》类书类与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并以此为例论证总集与类书之关系。然其根基已误，复持误本以讨论成见，正可见出其背后混同总集与类书的学术心理。

【作者简介】翟新明，男，湖南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目录学与集部文献。

①周必大撰、周纶编：《文忠集》卷一三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537页。

②《遂初堂书目》为尤袤家藏目录，然尤袤曾任职秘书省，且曾编纂四库书目，二者之间恐怕亦有关联，容待后续详考。前引杨万里《益斋藏书目序》载尤袤之言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则此处的《文馆词林》或系尤袤从秘书省抄出者。

③（合璧本）《玉海》卷五四，第1071页。